

《东方杂志》与中国新文化运动

DONGFANGZAZHI YU
ZHONGGUO XINWENHUA YUNDONG

赵黎明 /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责任校对：杜凤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杂志》与中国新文化运动 / 赵黎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 - 7 - 01 - 020939 - 5

I. ①东… II. ①赵… III. ①期刊 - 研究 - 中国 - 民国 ②五四运动 -
研究 IV. ① G239.296 ② 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8819 号

《东方杂志》与中国新文化运动

DONGFANGZAZHI YU ZHONGGUO XINWENHUA YUNDONG

赵黎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31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20939 - 5 定价：6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中庸思维”与杜亚泉的“新文化运动”.....	19
一、“中庸”思维与杜氏“调和”原理.....	19
二、“调和”之客体及其三种调剂形式.....	24
三、“调和”主体及其三个“主义”.....	29
四、杜氏“新文化”思想的价值及问题.....	33
第二章 改版前《东方杂志》与“文化调和论”.....	38
一、五四前后，“调和论”如何成为一个问题.....	38
二、“调和派”对于新文化派的反批评.....	44
三、“调和派”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构想.....	51
四、双声对话缘何演变为一种话语霸权.....	56

第三章 改版后《东方杂志》与“文化调和论”.....	61
一、编辑部对东西“调和论”的态度变化.....	62
二、“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的再次讨论.....	68
三、对于新旧“调和论”的态度变化.....	71
第四章 《东方杂志》对“文化杜威”的译介.....	81
一、“习”与“行”：颜李与杜威相遇.....	83
二、“假设”与“实验”.....	87
三、杜威与中国文化认同.....	93
第五章 《东方杂志》对“文化泰戈尔”的译介.....	100
一、泰戈尔的西方批判与欢迎者的“阅读期待”.....	102
二、东西文明性质差异及相处之道.....	107
三、不受欢迎的“泰戈尔”.....	112
四、泰戈尔与“中国文化的出路”讨论.....	115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文化罗素”的译介.....	119
一、从罗素视角再探中西文化关系.....	120
二、借罗素之口解剖中国“国民性”.....	124
三、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再次省思.....	128
四、罗素的两种苏俄镜像及其在中国的回响.....	132

第七章 《东方杂志》对“汉字革命”运动的反思.....	140
一、符号的随意性：“汉字革命”的理论偏执.....	143
二、“科学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神话.....	153
三、线型进化论的谬用.....	166
四、语文知识的选择性错误.....	174
第八章 《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187
一、被遗忘的戏剧“舞台”.....	187
二、旧戏存废与新旧剧关系的讨论.....	189
三、自觉为西方戏剧译介提供平台.....	198
四、译述西方戏剧，输入现代观念.....	209
五、提倡剧场改革，推动“小戏院”运动.....	216
第九章 《东方杂志》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224
一、现代文学批评倡导的时代语境.....	224
二、文学批评的概念、分类及功用.....	228
三、文学批评“原理”和批评家的责任.....	232
四、对现代文学批评流派的介绍.....	237
第十章 《东方杂志》对欧美“写实主义”文学的引进.....	247
一、引进“写实文学”，救“形式文学”之弊.....	247
二、“近代的写实主义，是新旧文学中间的摆渡船”.....	252
三、“科学洗礼”与“写实主义”.....	256

四、介绍“写实主义”，为新文学开辟道路.....	260
第十一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译介.....	268
一、对表现主义文艺的介绍.....	269
二、对象征主义文艺的译介.....	275
三、对未来主义文艺的介绍.....	280
四、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推介.....	283
结语：反思、对话与策应、充实	
——《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两个面相.....	288
附录：《东方杂志》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一览（1920—1931）.....	292
参考文献.....	312

导 论

—

《东方杂志》是近现代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综合性杂志，它创刊于1904年，终刊于1948年，共出刊物44卷819号（期）；如果把196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同名杂志（王云五任发行人）加在一起，总卷数达到50卷，可谓历时久远，卷帙浩繁。作为一家百科全书式的现代期刊，《东方杂志》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所有方面，堪称“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王云五），是中国杂志中“最努力者”（戈公振），是现代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和评价者，在现代报刊史、文化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近年以来，学界对《东方杂志》的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不同学科、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刊物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探讨，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东方杂志》研究一度成为传播学、文化学、文学研究等共同的“显学”。概括起来，这些研究大体上是从两

个“体”入手的，一是编纂主体，二是杂志本体。就编纂主体研究来说，这部分成果多聚焦于对“东方”诸子的专题考察。关于此类研究，高力克和王元化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在《调适的智慧：杜亚泉思想研究》，高力克通过现代视野反思杜亚泉的“调适”思想，对他的观点颇有“同情之理解”，重新认识了“调适”思想的现代价值；王元化在为《杜亚泉文存》所作的“导言”中，也对加诸其身的所谓“反对革新”的“误解”进行了多方辩驳，重新检讨了杜亚泉文化思想的历史合理性。这两部为杜亚泉“翻案”的著作，对后来的研究影响不小。另外也有一些著作，立足于东西文化比较的视角，对杜亚泉文化思想进行多方梳理与价值认定，如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论及杜亚泉在“中西医之争”的文化站位，刘黎红《五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研究》也列专章讨论“调和论”与新文化创造的关系，二者虽均将杜氏认作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但对其历史与当代价值却有新的认知。

而对于杂志的“本体”研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现代新闻史和舆论学等领域。在近代报刊发展历史框架中探讨《东方杂志》历史贡献的，先后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方汉奇的《中国新闻通史》等；而从舆论学角度论述杂志编撰思想、舆论导向以及社会影响的，较早有黄良吉的《〈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台湾），稍后有洪九来的《宽容与理性》和丁文的《“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等。黄著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对杂志的编辑、出版及传播情况有较为翔实的介绍，“对《东方》的整体性研究工作有前驱之功”^①；洪著对杂志的公共舆论属性和文化品格进行了探索。其特色是将《东方杂

^① 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志》的编纂群体冠以“政治理性主义”、“变革渐进主义”、“世界民族主义”、“文化调和主义”、“文学现实主义”及“学术进步主义”六大“主义”，并分别在这些“主义”的统摄之下，对“东方”同人从1904年到1932年近三十年的政治主张、文化思维及办刊理念等进行系统挖掘和爬梳。其对“东方”知识群体所概括的“自由”、“理性”、“调和”等文化品性为学界认同，应该说此书是《东方杂志》研究的重要收获。《“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成书的（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以杂志创刊伊始前四年即“选报”时期的“文选”为研究对象，利用“选报”的独特言说方式，一方面还原1904—1908年间晚清舆论的原生图景，另一方面彰显杂志独特的舆论理念及其从传统到现代转换历程。选题精审、考据详备、定性恰当，是近年涌现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

限于学科背景、研究侧重等因素，上述研究未过多地涉及文学领域，如《宽容与理性》就只辟一章篇幅，讨论《东方杂志》的文学内容。其所发现的《东方杂志》推动文学发展的线索——由启蒙民智的改良文学（1904—1920），到关注现实的人生文学（1921—1925），再到革命文学（1926—1932），以及这条文学主线所标示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等，也是为体现“东方”知识群体“稳健持重”之文化品性服务。虽然论者也发现，《东方杂志》“文学活动之积极、文学作品之丰厚、文学主张之醒目”，可以与《小说月报》一样，成为“传播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载体”^①，但并未在这个载体上下过太大的功夫，因而留下较多的探究空间。而丁文的《“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1904—1908）》，

^① 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诚如题目所示，论题锁定在 1904 年至 1908 年这个特定年份，且论证对象也仅仅囿于当时的“时论”，对“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始终未曾论及。

真正从文学本位研究《东方杂志》，要数王勇的博士论文《〈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①。这是从刊物与现代文学关系入手，研究《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学发生学意义较为全面系统的一本专论。作者借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将《东方杂志》看作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而将文学看作是这个“公共空间”的有机构成，在此基础上考察《东方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的独特功能和价值。论著的显著特色是并未将文学看成一种孤立因素，而是看成与具有多种关涉性的复合存在，力图在纵横交错的时空坐标上探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栏目如何与中国近现代文学发生深度关联？作者运用发生学理论，从编辑与杂志的文学面貌、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翻译文学及原创作品的发表等五个方面，还原了《东方杂志》参与现代文学建设的生动过程，重新评价了《东方杂志》在现代作家群体的形成、文学生态的营造以及文体的建构等方面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东方杂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然远非上述几项研究所能穷尽。就其与新文化及新文学的关系而言，值得深入探寻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比如 1911 年至 1932 年间与新文化及文学的关系问题就还有发掘的价值。这个时段，正是新文化、文学运动从萌蘖到发生再到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一家与新文化运动有着不同文化愿景的舆论刊物，《东方杂志》与新文化派有着不同诉求，其文化态度、文化策略，对“古今中外”

^① 本书立项之时（2011 年），王勇的博士论文《〈东方杂志〉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尚未出现，其在南开大学的答辩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文化关系的处理，均与新文化派有着不太一致的主张，二者之间不乏对话，但对话也充满紧张——这种张力体现最明显的当然是在杜亚泉时期（1911—1919）；不过，即使在杜氏“下野”、刊物改版、杂志态度日益倾向于新文化期间（1920—1932），她也仍以某种微妙的方式坚守自己的文化姿态。这一与新文化“貌合神离”（至少是一定程度）的现象，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二

作为一家延续数十年、横跨多个历史时期的老牌刊物，《东方杂志》的文化态度、编辑方针当然并非铁板一块，期间的几次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从创刊的1904年3月到1908年7月，这四年是所谓“选报”时期。在此时段，编辑方针具有鲜明的“东亚色彩”，创刊号推出的《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首款便提出“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作为刊物宗旨，而在体例上则“略仿日本《太阳报》，英美两国而利费体裁”。在内容方面，不仅不少文章直接摘自日本报刊，就是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也极力营造“东亚关系共同体”的氛围。此类例子举不胜举，且以创刊号第一页发表的“本社撰稿”（署名别士）《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为例略加说明。文章全面检讨了历史上中日分合恩怨的关系历史，其最引人注目的看点是，站在“东亚一体”的视角看待近代列强在华殖民活动。第一，将日本列为东方“文明之族”抗拒西方“野蛮之族”入侵的典范，将1904年日本对俄国的战争理解成为保留“古之文化”而进行的抗争行为，因而把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比况为东方民族抗拒

“胡马之蹂躏”的正义之举。“今日拒俄之事乃拒元之事之结果”^①，在论者眼里，日俄战争就是东方与西方的较量，是“黄种”与“白种”的较量，日本的胜利也就成为“黄种”打破“白种”神话的力证，“日俄交战，俄罗斯以四十余倍之地，三倍之人，历数年之经营，据形胜之要地，竟为区区日本所大困，种族强弱之说，因之以破，凡吾黄人其亦可以自奋矣。”^②很明显，之所以产生这种毫无民族尊严、毫无是非的糊涂观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东亚一体”的观察角度。

“选报”之后，经过了大约三年的过渡期，《东方杂志》迎来了它较为开放的杜亚泉时期。在杜任主编的近十年时间（1911—1919）内，《东方杂志》以“知世界大势”、“适应现在时势”、“切于人生实用”、“以将来进化之世界作预备”等为“杂志界之职务”^③，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译介，为国人了解世界大势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杂志》“世界视角”逐渐形成的时期，也是文化态度更为鲜明的阶段。创刊二十周年之际，《东方杂志》对此仍有清晰的记忆：

本志出世后的二十年间，学术界交通的便利，和思想界转变的强烈，亦开我国空前之创局。本志在这新生时代的思想战中，自愧不能为冲锋陷阵的先登者；但本志从不敢自弛其忠实的介绍的责任。如各派的社会主义，本志在十余年前，即已有系统的译述；柏格逊和欧根的哲学说，也由本志最先翻译。而

① 别士：《论中日分合之关系》，《东方杂志》1卷1号，1904年3月11日。

② 本社撰稿：《论中国民气之可用》，《东方杂志》1卷1号，1904年3月11日。

③ 景藏：《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东方杂志》16卷7号，1919年7月15日。

黄远庸先生运其融合文言文的新文体，对于社会政治为沉着深刻的批评，曾为本志馆外记者一年；其所著的想影录，是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读之，尚有“新发于硎”的锐气的。至于物质科学方面，因科学界的老宿杜亚泉先生，曾主编本志十年，所以对于世界的新发明和新发现，从来不会忽视^①。

基于这种世界性眼光和启蒙主义态度，不管在杜亚泉时期（1911—1919）还是在钱智修时期（1920—1932），《东方杂志》高举“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对中国大众进行不遗余力的思想启蒙。从启蒙内容来看，其与“新青年派”有着相当多的重叠。“本志虽涵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并不是说我们预备做一个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杂拌；也不是说，我们只想做牛溲马勃兼收并蓄的栈房。我们所占着的时间，既然是被科学精神与民治主义所支配的二十世纪，则我们估定一切言论和知识的价值，当然对于这两大潮流的向背为标准；欲追求世界知识而无暇阅读专书的人，做一种简明的报告”^②。当然，这种“一致”只是方向一致，在处理方式的选择上（如激进还是渐进），在对待“古今中外”关系问题上，《东方杂志》坚持了自己的特色，从而与新文化派拉开了距离。

首先，不忘向读者表明态度，但更注重为其提供“事实”，以便读者“做自下主张的底子”。这种“事实”优先、靠“事实”说话的“事实主义”，一直是杂志引进世界思潮、从事启蒙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改版之后，在跟进世界新潮方面确实比以前更为积极，然而这个原则不仅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有进一步明确和强化的趋势，在杂志的第二十

① 坚瓠：《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东方杂志》21卷纪念号（上），1924年1月10日。

② 坚瓠：《本志的第二十年》，《东方杂志》20卷1号，1923年1月10日。

年卷首，编者“坚瓠”这样表述：

今后所陈情于社会者，尤当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言论固以事实为归宿，然言论之托为根据者何物乎，则亦事实而已。凡吾人所主张，其仅凭主观之理想者，断不如凭客观之事实者之真切。而当兹世界历史，自旧时代而转入新时代之际，则尤非开拓心胸、旷观域外，不足以见事实之全体而定吾人立身处世之方针。本志之内容，向以记述世界大事为一大宗，今后将益努力于此，务期以最经济之方法，将世界发生之事实，为有系统之叙述……^①

而在创刊二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中，编者再一次明确提出“提供事实的真相，给读者做自下主张的底子”的启蒙策略：

杂志的本意是“仓库”，本来可以容纳复杂的材料；而本志则尤其自始以来，是一种普通社会的读物。所以，有许多人说，我们内容的不统一，说我们不能多发表政治问题的主张，我们是不能任咎的。据我们的意见，欲对现代的任何问题下一个公开确当的批判，其有待于知识之积储与事实之观察者，其种类和数量，皆至为繁颐；而逞臆悬谈，凭空立论，尤其是中国人传统的习惯。所以我们与其以感情的言论，刺激读者之神经，毋宁以有用的知识，开拓读者之心胸；与其发表未成熟的

^① 坚瓠：《本志之希望》，《东方杂志》17卷1号，1920年1月10日。

主张，使读者跟着走错路，毋宁提供事实的真相，给读者做自下主张的底子。换一句话说：我们是希望为舆论的顾问者，而不敢自居为舆论的指导者^①。

其次，尽管杂志取向鲜明，但在呈现态度时，善于将不同立场对等编排，以免读者陷入“先入之见、偏倚之心”，“本志仍不敢揭一派之旗帜以自限域，有时且故列两派相反之学说，以资比较。此非本志欲托于调停两可间，以为藏身之固也。调停两可者，于甲说取其半，于乙说亦取其半，其结果必至甲说乙说皆失其真相，而本志不然。其介绍甲说也，务存甲说之真相；其介绍乙说也，亦务存乙说之真相。两方面之真相既存，则吾人欲为最后之从违抉择，亦庶几不大背乎事实。惟当其寻求真相以为从违抉择之预备之时，则甲说乙说，必俱作平等观而后可。科学家之立断案也，必搜集各种证据，以验其有无反对之理由，不敢有先入之见、偏倚之心也。今日则正吾人搜集各种证据之时也。此本志不敢以一派之学说为定论也”^②。因此，《东方杂志》对于“世界之学术思想社会运动”，力求“以公平之眼光，忠实之手段，介绍于读者”^③，使其在比较之中选择，在选择之中比较，对于各种学说的“真相”有一个客观的判断。

1920年的改版，一般认为是整个编撰群体放弃“文化调和论”的标志，事实并不全是如此，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第一，《东方杂志》编者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文化调和派”——不仅杜亚泉不是，整个杂志

① 坚瓠：《本志的第二十年》，《东方杂志》20卷1号，1923年1月10日。

② 坚瓠：《本志之希望》，《东方杂志》17卷1号，1920年1月10日。

③ 坚瓠：《本志之希望》，《东方杂志》17卷1号，1920年1月10日。

同人也不是，他们认为自己不过是“事实派”；第二，改版之后，《东方杂志》的编者不仅没有放弃杜亚泉的思想，甚至还觉得“伧父”先生在文化问题上有先知先觉的英明。1924年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号上，来自编辑部的一篇文章透露了这个玄机：

本志虽素不主张夸大的国粹论和“中外古今派”的调和论，而立言造论，要自有其历史的根据。如颜李学派，经戴子高绍述以后，到最近几年，始有重光的机运，而本志则在二十年前，即有提倡颜李的文字。此外尚有一桩值得回忆的事，就是：欧战以后，伧父先生继续发表的东西文化论。此事虽曾经引起论坛的反驳，而且在今日时代落伍的中国，是不是可以提倡东方文化，也是一个问题，但是西洋文明的已露破绽，要为不可掩的事实。伧父先生在罗素尚未来华之前，即已有此种大胆的批评；而其批评的观点，基于中国正统派的儒家思想，亦较罗素之仅能窥见老庄一派的皮毛，更为切题：就文字的本身而言，终是可以佩服的^①。

这些文字从一个侧面说明，作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群体，面临舆论和市场的双重压力，它不得不做出某种观念上的妥协和调整，但整个文化立场和编辑理念还是在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底线。

当然，改版之后，言其编辑态度前后一贯，并不否认杂志编辑方向的某些调整。1921年18卷3号，“编辑室杂话”说明拟将刊登内容，

^① 坚瓠：《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东方杂志》21卷纪念号（上），1924年1月10日。